

## 明清之際夏允彝之死 及相關悼念詩文之敘事策略\*\*

許明德\*

### 摘要

明清之際，倖存的文人在悼念亡國的友人時，不得不面對兩難的局面：一方面，假如他們不書寫殉國義士的事跡，滿清王朝將可能把相關歷史全數刪去。另一方面，歷經明清易代而未殉國的人，在道德上難免會被人詬病，因此他們比平常人更難找到評價殉節義士的立足點。

本文以夏允彝作為切入點，分析命途各異的三位文人在書寫夏氏的死亡時所採用的敘事策略。本文先比較夏允彝、夏完淳父子的詩文，而舉出兩代在悼亡方面的異同，並看出忠、孝等概念如何體現在他們悼亡的作品中。接著，本文將分析陳子龍的〈報夏考功書〉與〈會葬夏瑗公〉，以點出他悼亡的同時如何解釋自己的存在意義。最後，本文將以宋徵輿為例，闡明他如何把祭悼夏允彝化為地方文化的一部分，並藉此說明入清以後，文人如何以不同的策略悼念前朝殉國的義士。

**關鍵詞：**夏允彝、夏完淳、陳子龍、宋徵輿、悼亡

---

2013 年 12 月 9 日收稿，2014 年 8 月 2 日修訂完成，2014 年 11 月 17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博士候選人。

\*\* 本文蒙李惠儀教授指導，在「2013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時，楊儒賓、王三慶教授亦提供了寶貴的意見，還有胡琦、黃丁如、盧志虹同學及兩位匿名評審人鞭辟入裏的建議與批評，謹此一併致謝。

## 一、前 言

入清以後，松江文人宋徵輿（1618-1667）曾經為悼念亡友李雯（1607-1647），把他的生平寫成〈雲間李舒章行狀〉。在這篇文章的最後，宋徵輿提到了當年陳子龍（1608-1647）、李雯與自己在京城中的一段軼事：三人在夜裏談到自己死後由誰作傳的問題。當時李雯隨意答道：「以年則當屬轅文（按：即宋徵輿）。然無奈其善病，何也？」<sup>1</sup>

這一番戲言，當時大概沒有人會認真對待。然而，到了 1647 年，當陳子龍抗清事敗而自沉，投降清室的李雯則在京城因病去世，宋徵輿不得不重新面對這段往事，執筆為自己的友人撰寫行狀。

宋氏對這段戲言耿耿於懷，是因為對於生者來說，要找到適當的文辭悼念逝去的親友無疑非常困難。這裏，加納（Nouri Gana）在閱讀了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悼亡集》（*The Work of Mourning*）後提出的「悼亡的兩難」，實在可以看成這段故事的註腳——他提到當一個人遇上親友離世，生者可以選擇靜默而任由死者被遺忘，抑或撰文把死者的一生簡化，並站在道德高地上計算死者一生的價值。<sup>2</sup> 無論生者如何選擇，他無可避免會察覺自己不可能有效地悼念自己熟悉的友人。

事實上，早在德里達自己的悼亡論述中，我們不難發現德里達一直在反思生者與死者之間的關係。對於德里達來說，悼念的對象畢竟已然死去。因此悼念的重點最終還是集中在生者如何重整自己對死者的回憶，並由此使死者活在自己之中，並從悼亡的過程中找到把對死者的印象內化（interiorization），並由此安身立命的方法。<sup>3</sup>

1 清·宋徵輿，〈雲間李舒章行狀〉，《林屋文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15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 10，頁 360。

2 Nouri Gana, *Signifying Loss: Toward a Poetics of Narrative Mourning*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1), p. 42.

3 兩位匿名評審人都對本文運用德里達的部分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再次在此致謝。有關「內化」的說法，請參看 Jacques Derrida, "Louis Marin (1931-32): By Force of Mourning," in Derrida, *The Work of Mourning*, edited by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p. 158-160.

假如我們將這種論述套用到經歷明清鼎革的文人身上，不難發現易代的經驗必然使這「悼亡的兩難」更加複雜。因為，一方面，倖存者假如不書寫殉國義士的事跡，滿清王朝將可能把相關歷史全數刪去，故此撰寫悼念詩文比往常更形迫切。另一方面，歷經明清易代而未殉國的人，在道德上難免會被人詬病，因此他們比平常人更難找到評價殉節義士的立足點。與德里達相似的是，悼亡對於明清文人來說，不單是記錄死者一生的方式，他們也同時在整理對死者的印象時，重新找尋自身定位的方式。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重新分析有關夏允彝（1596-1645）之死的詩文。冀能看出各文人如何利用不同的敘事策略去解決以上所提到的兩難局面。在這裏我們選擇以夏允彝作為切入點，原因有二：首先，出生於松江華亭的夏允彝在崇禎初年與同郡文人陳子龍、徐孚遠等結成「幾社」。直到他在 1645 年投水殉節，他一直都在這個文人群體的中心。因此，在他殉國以後，縱然這些文人命途各異，有的繼續反抗，有的投降清室，但他們無可避免要面對夏氏的死亡。

再者，孫慧敏在〈書寫忠烈：明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殉節故事的形成與流傳〉一文曾梳理夏允彝之死從晚明到民國初年的流傳過程，因此我們已能掌握夏氏故事的歷史變化。<sup>4</sup> 然而，由於該文主要從歷史角度切入夏氏之死，因此忽略了文人心態、敘事策略與這些敘述的關係。因此本文希望能對孫氏文章作一補充，並希望進而從這案例勾勒出悼亡的詩文在明清年間所歷經的變化。

以下本文擬先比較夏允彝、夏完淳父子的詩文，而舉出兩代在悼亡方面的異同，並看出忠、孝等概念如何體現在他們悼亡的作品中。接著，本文將分析陳子龍的〈報夏考功書〉與〈會葬夏瑗公〉，以點出他悼亡的同時如何解釋自己的存在意義。最後，本文將以宋徵輿為例，闡明他如何把祭悼夏允彝化為地方文化的一部分，並藉此說明入清以後，文人如何以不同的策略悼念前朝殉國的義士。

---

4 孫慧敏，〈書寫忠烈：明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殉節故事的形成與流傳〉，《臺大歷史學報》26(2000.12): 263-307。

## 二、倖存的紀錄——夏允彝與夏完淳的詩文

夏允彝留下來的詩文不多，他的別集沒有傳世固然是其中一個原因。不過，更重要的是，夏允彝所撰寫的詩文本來就很少。宋徵璧（1602?-1672）《抱真堂詩話》曾經提到他不好作詩，有人在筵席上強迫夏允彝寫詩，他答道：「我不善飲，能強之飲乎？」<sup>5</sup> 同樣地，朱彝尊（1629-1709）在評論夏允彝時也提到：

「幾社」六子，瑗公以經義見長，詩非專尚，然其撰《長樂志》境有孝子節婦，必賦詩以旌之，集中樂府，未嘗不合古人也。<sup>6</sup>

這段記述除了說明夏允彝不專事詩文，更說明了他怎樣看待詩歌的作用。對於夏氏來說，詩歌的重要性在於它能記錄其他人的一生，從以表彰這些人所擁有的道德價值。於是，詩歌變成了一種能夠旌表賢士，讓他們的精神超越時代的工具。

正因為詩歌有這樣的功能，夏允彝在 1645 年嘉定淪陷時，為悼念自己在練川殉國的五個亡友寫下了〈練川五哀詩〉。而在這組詩的序言中，夏允彝已經提到「余將相從於地下」。<sup>7</sup> 可以說，這五首詩除了為自己的朋友而作，同時也象徵了夏允彝對後人如何悼念他的一個想像。

在這五首詩中，不難發現一個共通的對「奇」的褒賞。無論是讚嘆侯峒曾（1591-1645）「負節本奇特」、「時俗尚和同，君懷嗜沉嘿」，<sup>8</sup> 抑或是頌揚黃淳耀（1605-1645）的「黃子不偶生，大雅寡諧俗」，<sup>9</sup> 詩歌的重心均放到

5 清·宋徵璧，《抱真堂詩話》，收入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 123。

6 清·朱彝尊著，姚祖恩編，黃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頁 630。

7 明·夏允彝，〈練川五哀詩·侯京兆峒曾〉，收入明·夏完淳，《夏完淳集》（上海：中華書局，1959），附編 2，頁 199。

8 明·夏允彝，〈練川五哀詩·侯文學雲俱〉，收入明·夏完淳，《夏完淳集》，附編 2，頁 199。

9 明·夏允彝，〈練川五哀詩·黃進士淳耀〉，收入明·夏完淳，《夏完淳集》，附編 2，頁 200。

亡友遺世獨立的形象之中。這種不與世俗相諧的描述，把五位義士連繫起來，解釋了他們同時在明清易代之中殉國的結果。而夏氏要我們留意的是，在歷史的洪流之中，這些特立的性格只能透過殉國彰顯並保存下來。在為張錫眉(?-1645)而題寫的詩中即提到：

理亂有代謝，反覆見傷殘。代謝未足信，傷殘不忍看。烽火連城市，笳鼓暗林巒。大邦不可控，蕞爾誠復難。……復有賢達婦，百感摧心肝。願傍要離塚，攜手同心酸。百卉偕腐朽，渺渺思荃蘭。<sup>10</sup>

這首詩以家國安定與紛亂開首，提出一種「循環代謝」的時間觀。在這種循環不息的歷史中，不斷出現在張氏眼前的是亂世中百姓傷殘的畫面。這裏詩人不禁要質疑：歷史的循環是否足以採信？人類如何面對歷史所帶來的慘不忍睹的景象？真正有能力超越這種循環往復的「理亂」的東西究竟存不存在？

夏允彝在詩歌的末尾提出答案：張氏婦人為殉國的張氏而死，縱然百花同樣歸於死亡，不能逃避枯竭的命運，但二人卻可以使後來者能從他們身上想到芳香的「荃蘭」。植物的比喻回應篇中開首「代謝」一詞，從一方面說植物的死亡是時間一往不返的結果；但從另一方面看，張氏夫婦殉國的精神並不只感染到百卉，他們同時在人心勾起了荃蘭的想像。夏氏在這首詩把殉國處理成一種能感染他人的行動，同時也是主動超越時間的方式。

夏允彝從殉國的命運把亡友連繫起來，卻未曾感到道德上有所虧缺，原因是他清楚意識到自身亦將要跟隨這些亡友為國自沉。對於夏允彝來說，他要面對的是國族的責任，因此必須殉國盡忠。但夏允彝對於自己的家室亦責無旁貸，如此一來，他不能不考慮殉國對家人的影響。在〈練川五哀詩〉中，他用三首詩寫侯氏父子——侯峒曾和兒子侯幾道、侯雲俱，在在可以看出他對「忠」、「孝」等問題的思考。尤其他在題寫侯峒曾的詩中，設想侯峒曾訓示二字的場景：「公語二子前，生死義各得。」<sup>11</sup>

誠如趙園所述，明清之際士大夫的遺民身分並不世襲。雖然明亡以後，

10 明·夏允彝，〈練川五哀詩·張孝廉錫眉〉，收入明·夏完淳，《夏完淳集》，附編 2，頁 200-201。

11 明·夏允彝，〈練川五哀詩·侯京兆峒曾〉，收入明·夏完淳，《夏完淳集》，附編 2，頁 199-200。

曾出仕的士大夫有死節之義。但那些未及在明亡前應考科舉的新生一代，其實並沒有為國盡忠的責任。<sup>12</sup> 因此，站在明代的士大夫立場來說，自己殉國以盡忠，兒子保命以盡孝，幾乎是最能在易代之際唯一做到「忠」、「孝」兩全，各得其義的做法。當然，從兒子的角度說，苟且偷生是否真正能算作篤守孝道？在夏允彝寫侯雲俱的詩中，就明顯觸及這問題：

上堂辭祖母，下與仲兄別。存亡在須臾，東甲飲劍血。父兄既先登，重關暮雲薄。……樓櫓既已摧，忠臣相繼沒。嗚呼侯氏子，一門皆卓犖。<sup>13</sup>

夏允彝開首即想像侯雲俱辭別家人的狀況，目的是要表明他在犧牲前亦有顧及自己的家族。而詩中最後以侯雲俱殉國的決定視為光耀宗室的行為，似乎要回應詩歌開首的場景，說明殉國也可視為另一種意義上的「孝」。夏允彝在這裏沒有再標榜「生死義各得」，反而褒賞兒子死節的行為。這一點與他自己在〈絕命辭〉中所提到「少受父訓，長荷國恩。以身殉國，無愧忠貞」中融合「忠」、「孝」的說法可謂一脈相承。<sup>14</sup>

夏允彝詩中讚賞侯雲俱殉國的舉動，實則點明了兒子繼承父志的責任。這難免會對夏完淳有所影響。由此我們把焦點轉到夏完淳身上，重新思考他所面對的情況：或許夏允彝也會在他面前提過與「生死義各得」相類的話，但這並不代表能完全撇清自己殉國的責任。這樣一來，夏完淳在撰寫悼念父親的作品時，必然要處理的是自己如何繼承父志，以至於應否殉國的問題。

最終，夏完淳把握的是父親的另一角色——歷史的記述者。夏允彝為他最後的歷史紀錄《幸存錄》撰序時提到：

予也應死之人也。生平未暇多讀書，時有著述，隨手淪散。今待死耳，又復何云。然於國家之興衰、賢奸之進退、虜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懼後世傳之失實也，就予所憶，質之言乎？言之或幸而存，後世得以考焉。<sup>15</sup>

12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381-386。

13 明·夏允彝，〈練川五哀詩·侯文學雲俱〉，收入明·夏完淳，《夏完淳集》，附編 2，頁 201。

14 明·侯玄涵（1620-1664），〈吏部夏瑗公傳〉，收入明·夏完淳著，白堅箋校，《夏完淳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附錄二，頁 519。

15 明·夏允彝，《幸存錄》（《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16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頁 1。

夏允彝的序說明，明亡以後，能精確地保留自身對國家盛衰的見證也是時人的責任。因此，「幸存」二字別具意義，因為它一方面說明了此書與夏氏平常隨手淪散的著述不同，有保存下來的必要。但同時，它也反映了夏允彝的焦慮，《幸存錄》不見得能夠逃過淪散的命運，所以他借用了人類僥倖存活的意象而把它命名為「幸存」。<sup>16</sup>

夏完淳看出「幸存」背後的含義，因此他把延續父親的著述，看成自己繼承父志的方式。細檢夏完淳的撰作，不難發現他亦步亦趨，處處均有續寫夏允彝著作的痕跡。夏完淳的《續幸存錄》固然是《幸存錄》的延伸，〈練川五哀詩〉在夏完淳筆下則成為〈六哀詩〉。而〈六哀詩〉的最後一首，正是夏完淳用來悼念父親夏允彝的作品：

嗚呼先文忠，橫劍誓河曲。周旋帷幄間，指揮百靈伏。天驕逞暴時，帳下三千哭。從容蹈東海，景耀長回燭。九京有同心，天門策龍足。閔予癯獨人，哀哉集荼蓼。<sup>17</sup>

夏完淳的這首詩從描摹夏允彝指揮軍隊守城的景象開始，通篇都在塑造一個忠臣形象。無論是寫他帳下三千士兵為明亡而哭，抑或刻畫他從容就義，詩中處處都能見出夏允彝的忠義及其感染力。比對首句，夏完淳似乎有意識以這一些片段解釋夏允彝的為人如何能配合他的諡號「忠」。

接著，夏完淳轉入自己的想像，想像九泉中有同樣決心的人，現在都應跟隨自己的父親在天門之前策龍飛躍。這種形象所以特別，原因是有關夏允彝的這首詩在〈六哀詩〉整組詩的最後。這裏讀者必然會把夏允彝與〈六哀詩〉，甚至〈練川五哀詩〉所提到的義士連繫起來，把他們想像成一個在道德上超然於世的群體。而最後，詩歌從天門的想像返回對自己的描寫——「閔予癯獨人，哀哉集荼蓼」。

這首詩與夏允彝的〈練川五哀詩〉最明顯的區別，正正在於夏完淳詩末的處理方式。夏允彝在〈練川五哀詩〉中經常會替他所哀悼的友人下一評斷，

16 英語著述中往往有把《幸存錄》翻譯成 *The Record of a Fortunate Survivor*，意思是「倖存者的紀錄」，然而，按照夏允彝的序，似應翻譯成 *The Record that Luckily Survived*（有幸存在的紀錄）。

17 明·夏完淳著，白堅箋校，《夏完淳集箋校》，卷3〈六哀詩·先考功〉，頁108。

而讀者往往不易察覺詩人本身的位置。但是，夏完淳在這首詩卻刻意教讀者看到詩人的身分，教我們知道他被這群殉國的義士排除在外，教我們明白他根本不可能高高在上地品評自己的父親。最終，父親的「忠」其實是透過他們筆下的這群義士來加以肯定的。

夏完淳避開了直接評價父親的「忠」，源於本文開首所提到的「悼亡的兩難」。夏完淳從父親繼承了書寫亡國的見證的責任，但同時他也有相應的焦慮，因為他清楚意識到自己沒有資格去衡量為國犧牲的父親的忠義。於是，他在哀悼父親時，無法不運用其他策略去論述自己父親的一生。

夏完淳其餘的詩作，似也甚少觸及父親夏允彝的評價。<sup>18</sup> 只有到了夏完淳密謀起兵事敗而被捕下獄以後，他的作品才出現把自己與父親相提並論的地方。郭沫若曾經提到夏完淳「被捕後之文，如〈土室餘論〉、〈獄中上母書〉、〈遺夫人書〉，亦均是血性文字。」<sup>19</sup> 這正好說明夏完淳在得悉自己即將赴死以後，文章有了顯著的變化。茲節錄〈獄中上母書〉為例：

人生孰無死，貴得死所耳。父得為忠臣，子得為孝子，含笑歸太虛，了我分內事。大道本無生，視身若敝屣，但為氣所激，緣悟天人理。惡夢十七年，報仇在來世。神遊天地間，可以無愧矣！<sup>20</sup>

這篇幾乎可當作夏完淳的「絕命辭」來讀。他點明了自己將追隨父親殉國，借用對夏允彝忠義的評價，說明自己從容就義不過是繼承父親的志業，體現孝道。貫穿這段文字是夏完淳對本份的思考，不論提出自己含笑赴死只是實踐本分，或是有關自身士氣有所激發，甚至於對來生報仇的寄託，內容無不與為人為子的責任相關。這種責任今生只能通過犧牲生命來實踐，而實踐的結果即神遊天地而無愧於心。

---

18 按照白堅的繫年，夏完淳寫在乙酉國難家難後的作品中，有〈寒食掃墓〉一詩，內容與祭拜夏允彝有關：「遺恨荒草綠，東風闐闐開。龍蛇知火息，鴻雁及春回。芳草新烟積，輕花舊雨來。王哀私教授，長起〈蓼莪〉哀。」篇中集中在描寫墓地景象，詩末以晉代王哀每讀《詩經》〈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句必然下淚事，表明自己對父親的思念。由此可以看出篇中並無評價父親的部分。詩見明·夏完淳著，白堅箋校，《夏完淳集箋校》，卷 5〈寒食掃墓〉，頁 227。

19 郭沫若，《歷史人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夏完淳〉，頁 219。

20 明·夏完淳著，白堅箋校，《夏完淳集箋校》，卷 9〈獄中上母書〉，頁 414。

此篇所以能對夏父的「忠」作一評價，歸根咎底是夏完淳已經預視自己即將為國而死。責任的解脫，促使他在論斷父親時再沒有道德包袱。我們不難從這一段看到，夏完淳已經撇開了〈六哀詩〉中孤苦的形象，反而以與夏允彝「余將相從於地下」相類的姿態出現。他重新建立自己與父親的關係——他的死說明自己正式完成繼承父親志業的本份。

綜觀夏完淳一生的作品，夏完淳在確定自己即將殉國前，其實一直存在一種道德上的焦慮與掙扎。假如說，這種道德問題不啻使夏完淳無法直接評價自己的父親，同時也促使他採用某些策略來悼亡。那麼，陳子龍的處境又如何影響他悼念夏允彝的作品呢？以下即討論陳子龍的〈報夏考功書〉與〈會葬夏瑗公〉。

### 三、倖存者的解釋——讀陳子龍〈報夏考功書〉 與〈會葬夏瑗公〉

事實上，夏允彝與陳子龍的死相隔只有一年。對於陳子龍來說，夏氏的死一直在這一年間纏繞著他。《南吳舊話錄》就曾經提到，陳子龍在收到夏氏死亡的消息後，「一慟幾絕，歎曰：『瑗公自是令僕材，一朝騎箕，吾何堪獨存面目，使天下士猶稱陳、夏！』」<sup>21</sup> 事實上，當時士人彷彿也有對陳子龍沒有追隨夏允彝殉國議論紛紛，不僅夏之旭（?-1647）的〈絕命辭〉有「惜哉卧子，何不早決」的說法，<sup>22</sup> 另如曹家駒《說夢》即有以下的批評：

鼎革之際，惟繩如瑗公，從容就義，言之齒頰俱香。即卧子一死，直是迫于計窮，未得與吳〔按：即吳應箕（1594-1645）〕、夏比烈也。<sup>23</sup>

曹氏以吳應箕、夏允彝為例，批評陳子龍沒有及時殉國，這其實也是陳子龍對自身生存念茲在茲的質疑。考慮陳子龍的處境，他是夏完淳的長輩。相對

21 清·李延昱，《南吳舊話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下，頁 248-249。

22 《明末忠烈紀實》中錄有夏之旭的〈絕命辭〉，可參清·徐秉義撰，張金莊校點，《明末忠烈紀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卷 16，頁 355。

23 清·曹家駒，《說夢》（《四庫未收書集刊》第 10 輯第 1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頁 254。曹家駒為明清之際人，有關其生平及著述可參來新夏，《清人筆記隨錄·附〈清人筆記中社會經濟史料輯錄〉》（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15-118。

來說，他與夏允彝的身分有很多相似之處。兩人既同時入仕大明，又曾創辦幾社，因此在當時的環境下，大概有不少遺民（甚或包括陳子龍自己）都會認為陳子龍有更多的責任為國犧牲。

〈報夏考功書〉即是陳子龍在面臨對自己生存意義的質疑下寫成的作品。文章開首即直接交代自己從松江逃亡的狀況：

自足下長逝，遂已歷期。每一念至，心焉如割。而不孝瑣尾遁荒，寄命鋒鏑，復負大痛，瑩瑩垂廬，遙望家山，如在異域。既不能修朋友之服，哭寢門之下，若荀爽之於仲弓，<sup>24</sup> 巨卿之於元伯；<sup>25</sup> 又以文翰蕪落，意志危惑，楚招秦贖，未遑綴染。<sup>26</sup>

文章的開首即點出陳子龍對夏允彝的愧疚。他作為夏允彝的好友，在夏氏殉國時不但沒有到其門前弔唁，而且也沒有為其題寫任何祭拜文章。陳子龍有所失誤，並將自己與荀爽、巨卿相提並論，目的是要表明他為了保命，沒能遵守朋友之誼。當然，陳子龍的逃亡，不單單是私交上的過失。從整個國族的立場看，這裏隱含的是一個失節的問題。因此他接著寫到：

足下臨殉，手疏見訣，不責以偕亡，而有所敦勉。一載於茲，邁會闕阻。曾無毫髮以獲死所，竊恐良友必含憤於首陽之側矣。<sup>27</sup>

陳子龍轉到夏允彝在臨終前寄到自己手上的一封書札，提到夏氏沒有責成自己與他一起殉國。然而，在這一年間，他耿耿於懷的是自己仍沒有為國犧牲的機會，反而隱居不仕，成了氣節有所虧缺的遺民。到這裏，陳子龍在追憶夏允彝時所面對的處境就十分明顯——他沒有辦法不思考自己「上負國家生成之恩，下負良友責望之旨」的問題。

陳子龍寫到這裏，就開始轉入對夏允彝的懷想，包括他對自己的提攜，兩人二十年來的交情等。值得注意的是，陳子龍在追述他們的交往後，最後

24 仲弓，即漢末陳寔。陳寔死後，司空荀爽等嘗披麻戴孝，執子孫之禮。

25 巨卿、元伯分別指范式、張劭。兩人雖不同鄉，卻為生死之交。張劭病重而死，范式忽夢見張劭，囑咐范式趕往墳前相送。後來，張劭的棺槨一直未能入墓，直到范式趕到送別，張劭的靈柩方能進穴。

26 明·陳子龍著，王英志輯校，《陳子龍全集》中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陳忠裕公全集》，卷 27〈報夏考功書〉，頁 831。

27 同上註。

對夏允彝所下的評價：

事當橫流，以身殉難者多矣。或迫於勢地，計無復之；又或激發，乘一時之氣。豈若足下素所蓄積，舍命不渝，如履常蹈和者哉！上報九廟，下存三綱，太史公以屈子「與日月爭光」，又云「死有重於泰山」，若足下可當之矣，更復何恨！<sup>28</sup>

這一段所以特別值得重視，是因為這其中隱然透露了陳子龍從愧疚中掙脫出來的方法。他引述了司馬遷評價屈原的說法，來說明夏允彝殉國的氣節。不論夏氏的作為是否真的可媲美屈原，這過程中陳子龍已悄悄把自己套進太史公的角色。

其實，重新考慮這封書信，我們處處可見陳子龍模仿司馬遷的痕跡。首先，從文體上說，陳子龍選擇以書信形式行文，又提到「死有重於泰山」一句，本來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進一步說，陳子龍在文章的不少地方都有意識地借用了太史公的筆法來行文。且看以下一段：

上之不能伏歐刀，赴清流，速自引決，留皎皎之身，以上先人邱隴；次之不能重抵跋涉，南走閩、越，西奔滇、蜀，痛哭於北滿之庭，以幾幸宗廟之復血食；下之不能客遊下邳，結納滄海，持長挾短，以懷縱橫之計，而乃竄處菰蘆之下，栖伏枋榆之間，往來緇羽，混跡屠沽，若全無肺腑者。<sup>29</sup>

這裏句式、句意都與太史公〈報任少卿書〉羅列自身「四事無一遂」的一段措辭完全相同。<sup>30</sup> 或者可以說，陳子龍所以要模仿太史公，是因為他意識到兩人要處理的議題非常相似。他們同樣希望解釋自己存活在世的意義，而事實上，他們的解釋亦有相通之處。兩人的生存都爲了完成某些責任：司馬遷爲了完成先公緒業，撰作《史記》一書，所以寧受宮刑亦不願自殺；至於陳

28 同上註，頁 834。

29 同上註。

30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中即有「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岩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又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見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收入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第 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 41，頁 1856-1857。

子龍則是因為「門祚衰薄，五世一子」，所以要先忍辱負重以報答祖母，以後再伺機為國殉節。

杜潤德（Stephen Durrant）分析〈報任少卿書〉的文章在這裏特別具啓發性：他曾經提出司馬遷在寫〈報任少卿書〉時反覆引用孔子的話，最後讀者會看到司馬遷與孔子的聲音重疊起來。而且史遷在訴述自己的生命時，經常大量徵引前人忍辱偷生的經驗，最終司馬氏的生存不再是不合道德的特例，他的經驗消失在這些古人的生平之中。<sup>31</sup> 同樣的分析完全可以套用到陳子龍的〈報夏考功書〉中，他不但引用史遷的說話來評價夏允彝，而且最終又引用〈報任少卿書〉的名句「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來討論自己的生存。不難想像，一個熟悉中國文學傳統的讀者在讀畢〈報夏考功書〉後，也會把陳子龍與司馬遷的聲音混同起來。

至於引用先賢，〈報夏考功書〉也有大量徵引前人的部分。茲舉一段為例：

夫趙有程嬰，<sup>32</sup> 智有豫子。<sup>33</sup> 楚士一出而《無衣》賦，<sup>34</sup> 韓臣棄家而《素書》出。<sup>35</sup> 何則？精誠之至，事有會合也。彼千乘之國，一家之臣，而尚有如此之士，豈天下萬里，養士三百年，遺民數百萬，而遂無一人乎？<sup>36</sup>

陳子龍列出程嬰、豫讓、申包胥、張良等人報效國家的事，來說明士子精誠

31 Stephen Durrant, "Self as the Intersection of Traditions: Th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of Ssu-ma Ch'ie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6.1(1986.1): 33-40.

32 春秋時代，晉國屠岸賈以趙盾參與殺害晉靈公為由攻襲趙氏，消滅了趙氏全族。程嬰為保留趙氏血脈，冒險藏匿趙氏孤兒趙武，並將他撫養成人。事見漢·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43〈趙世家第十三〉，頁 1783-1785。

33 春秋時代，豫讓在智伯門下任職，由於智伯看重他的才能，因此在趙襄子消滅智伯以後，一直伺機刺殺趙襄子。事見漢·司馬遷撰，《史記》，卷 86〈刺客列傳第二十六〉，頁 2519-2521。

34 戰國時代，吳王闔閭與伍子胥伐楚，攻入郢都。楚大夫申包胥到秦國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秦哀公為他賦《無衣》，並派兵馬救楚，於軍祥打敗吳師。事見漢·司馬遷撰，《史記》，卷 5〈秦本紀第五〉，頁 197-198。

35 秦國在公元前 230 年滅韓後，祖先是戰國時韓國人的張良由黃石公身上得到《太公兵法》，後成為漢高祖劉邦的謀臣，漢朝的開國元勳之一。事見漢·司馬遷撰，《史記》，卷 55〈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頁 2034-2035。

36 明·陳子龍著，王英志輯校，《陳子龍全集》中冊，《陳忠裕公全集》，卷 27〈報夏考功書〉，頁 835。

或能改變政局，由此推衍出自己努力復國，或能改變明亡的結果。其實，陳子龍所舉的例子是經過挑選的，因為整篇〈報夏考功書〉所提到的人物全部都取材自《史記》。在這裏，我們再次看到陳子龍以太史公的聲音解釋自己的生存。他的待機而動也就在這一系列前賢中得到合理的解釋。

誠如陳子龍的學生王澐（1619-?）所言，陳子龍在夏允彝死後「有〈報夏考功書〉，自道平生志行甚具，後人讀其書，知先生意矣。」<sup>37</sup> 王澐把〈報夏考功書〉讀成陳子龍剖白生平志向的文章。這正可引證上述的分析——陳子龍在這篇文章運用〈報任少卿書〉作為模範，在祭悼夏允彝的同時，為自己的生存找到了根據。

以上集中從行文策略分析〈報夏考功書〉，以說明陳子龍如何構築一種對自己生存的意義的解釋。但即使陳子龍能提出這樣的一種解釋，並不代表他就能完全拋開自己失節的愧疚。回到這篇文章的文體與篇題，我們可以知道陳子龍書寫的對象由始至終都是夏允彝。如此一來，〈報夏考功書〉其實可以看成一篇祭文，陳子龍的寫作目的是要向已死的友人道歉和解釋。可以說，陳子龍清晰地知道，這篇文章並不會得到任何回覆。那麼，他想要的原諒，也就永遠不會從夏允彝的回應中得到。

陳子龍為夏允彝寫的不僅〈報夏考功書〉一篇。從陳子龍的創作歷程看，即使走到生命的盡頭，陳子龍仍糾纏於夏允彝的殉國之中。根據王澐為他的老師續寫的年譜，我們可以看到陳子龍在「順治四年三月，會葬夏考功，賦詩二首；又作〈寒食〉、〈清明〉二詞，先生絕筆也。」<sup>38</sup> 以下我們看看〈會葬夏瑗公〉中陳子龍如何紀念夏允彝的事跡：

丹旄飄颻岸柳疎，平蕪渺渺正愁予。<sup>39</sup> 驚濤不盡邸〔鷗〕夷血，<sup>40</sup> 痛哭空

37 清·王澐續，〈陳子龍年譜〉，收入明·陳子龍著，王英志輯校，《陳子龍全集》中冊，《陳忠裕公全集》，卷 31，頁 990。

38 明·陳子龍著，王英志輯校，《陳子龍全集》上冊，《陳忠裕公全集》，卷 17〈會葬夏瑗公〉，頁 589。本文將集中討論〈會葬夏瑗公〉二首，至於陳子龍臨終前作的〈唐多令·寒食〉，孫康宜已有詳細的分析，參見 Kang-i Sun Chang, *The Late-Ming Poet Ch'en Tzu-lung: Crises of Love and Loyo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87-91. 中譯本見孫康宜著，李爽學譯，《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頁 141-170。

39 「正愁予」三字，語出《楚辭》〈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留賈傳書。<sup>41</sup> 華嶽暮雲來大鳥，沅江春草媵文魚。<sup>42</sup> 范張未畢生平語，<sup>43</sup> 淚灑南枝恨有餘。<sup>44</sup>

這是〈會葬夏瑗公〉的第一首，詩中以墳前祭拜的景象開首，喪葬用的旌幡和代表辭別的楊柳中，詩歌提醒讀者詩人的位置——他站在荒蕪的平原中，視線迎向荒蕪的平原。「正愁予」三字典出《楚辭》〈九歌·湘夫人〉，讓讀者看到詩人與在湘水等待帝子降臨的湘夫人的相似之處。詩人也在水畔等待某人到來，於是詩人目光轉向江水之中。可惜的是他要等待的人已然逝去，留下來的只有驚濤也不能洗盡的邠夷血。詩人只可能為留下來的空文痛哭流涕。

詩的第三聯以大鳥、文魚兩者的來臨，側襯出詩人的期待。正因詩人還在等待夏允彝回來，所以他對周遭環境的動態特別敏感。這首詩最終反用范、張典故收結，以二人死前無法講盡平生語，引出自身的遺憾。這首詩全以陳子龍的視角寫成，關鍵是詩人如何從周邊的所有景色看出與夏允彝的聯繫。但最後等待的心情落空，周圍景色反而突出了夏允彝的缺席。詩人自身只能處於悵然若失的境地，為故國、故友灑淚。

假如說，陳子龍這首詩旨在表現詩人自身的茫然，始終沒有觸及自己對夏允彝的評價，那麼〈會葬夏瑗公〉的第二首，則更直接處理自己如何看待夏允彝殉國的事：

二十年來金石期，誼兼師友獨追隨。冠裳北闕同遊日，風雨西窗起舞時。<sup>45</sup>  
志在《春秋》真不爽，行成忠孝更何疑。自傷舊約慚嬰杵，<sup>46</sup> 未敢題君墮

40 公元前 484 年，伍子胥因被伯嚭所讒，而被吳王賜死。伍子胥留下遺言，要其舍人於他死後把他的眼睛挖出，掛在城門上，以親眼觀看越國滅吳。吳王聞之大怒，把伍子胥的屍體放到鴟夷的皮革內，並拋棄到錢塘江上。

41 賈傳，指賈誼，為漢長沙王太傅。賈誼過湘水時，曾投書以弔屈原，故「賈傳書」或指憑弔之辭。又賈誼曾上書討論漢室政局，故「賈傳書」亦可能指政論文章。

42 「文魚」二字，語出《楚辭》〈九歌·河伯〉：「靈何為兮水中，乘白鼉兮逐文魚。」

43 范、張分別指漢朝的范式與張劭，事見註 25。

44 南枝，即南向的樹枝，多借用來象徵故國之思。《周書》〈杜杲傳〉：「王褒、庾信之徒既羈旅關中，亦當有南枝之思耳。」

45 用東晉祖逖聞雞起舞事。祖逖與劉琨同任司州主簿，二人關係密切，晚上同被而眠。半夜時分聽到荒野外雞鳴之聲，即披衣起床，拔劍而舞。

46 嬰，指程嬰，事詳見註 32。杵，指公孫杵臼，趙盾、趙朔父子的門客。趙氏被屠岸賈滅門時，程嬰曾帶孤兒趙武投靠公孫杵臼。此時屠岸賈下令要將全國半歲以下的嬰兒

淚碑。<sup>47</sup>

詩歌首聯以回顧與夏允彝二十年的交情開首，頷聯接以對二人相處的片斷的懷想。留意其中呈現時間的方式，可以看出陳子龍的思考越來越具體。詩人由第一聯二十年的懷想，轉入第二聯一時、一日的描寫。到了第三聯，陳子龍追述夏允彝的志向，當中時間的呈現又有差別。與陳子龍追思二人互相砥礪的一日一時相比，夏允彝追求的是在更宏大的歷史——《春秋》——中找尋理想的人格。頷、頸二聯所呈現的對比，說明陳、夏二人抱負的落差，帶來的是陳子龍對自己不能隨夏氏而死的羞愧，而至最終不敢題寫夏氏的碑文。

詩末的一句「未敢題君墮淚碑」十分值得注意，因為它提醒我們陳子龍在悼念夏允彝所用的策略。〈會葬夏瑗公〉本來就是為悼念夏允彝的行為而寫下的作品，但陳子龍卻在詩末清楚交代自己沒有資格去旌表夏允彝。這種「不寫而寫」的情狀，不但迴避了他人可能指責自己沒有及時殉國，反而把讀者的焦點放回夏氏的成就，成功突出夏允彝為國犧牲所帶有一種不可言喻的崇高價值。

〈會葬夏瑗公〉兩首雖然立足點不盡相同，但讀者不難發現詩人的無力與掙扎貫穿兩首詩的論述。雖然知道滿目江山處處提醒夏允彝的缺席，自己既是返魂乏術，甚至連題寫夏氏的碑文也於心有愧，但陳子龍仍然決定要把〈會葬夏允彝〉寫出來。有別於傳統文學史中所鋪陳的愛國詩人的形象，我們可以從這首詩看到陳子龍臨終前比較糾結的另一種面目。

#### 四、地方文化的保存——宋徵輿及其作品

姚蓉在《明末雲間三子研究》中曾經比較陳子龍的〈會葬夏瑗公（其一）〉與宋徵輿的〈懷亡友於陵孟公〉，認為宋徵輿表達情感的濃烈程度遠遜於陳子

---

殺絕，程嬰與公孫杵臼商議，決定獻出親生兒子以保全趙家血脈。最終程嬰的親生子代替趙武被殺，公孫杵臼在大罵屠岸賈後觸階而死，程嬰成功將趙武撫育成人。趙武長大後，向晉悼公稟明屠岸賈殘害忠良之事，屠岸賈被處死，趙家亦因此得報大仇。

47 明·陳子龍著，王英志輯校，《陳子龍全集》上冊，《陳忠裕公全集》，卷17〈會葬夏瑗公〉，頁589。

龍。<sup>48</sup> 情感表達的濃烈與否，固然與作者的筆力和情感息息相關。但這觀察背後或更可說明兩人處境的不同。陳子龍撰寫〈會葬夏瑗公〉的時候，清廷管治尚未穩定，當然比較有空間去悼念為大明殉難的夏允彝。至於宋徵輿，一方面他是降清的官員，另一方面滿清政府已逐漸留意到士大夫的言論，這樣的環境下他不太可能肆無忌憚地寫作悼亡的作品。

反過來說，細讀宋徵輿的《林屋文稿》，不難發現宋徵輿也沒有因為複雜的政治環境而選擇三緘其口。他在不同的作品中亦有追悼前朝的殉國者，譬如他在 1648 年為夏允彝所寫的〈夏瑗公先生私諡說〉便是其中一個好例子。<sup>49</sup>

〈夏瑗公先生私諡說〉是一篇以對答體寫成的文章，篇中以陳子龍與宋徵輿的討論組成，內容主要圍繞夏允彝的諡號展開。篇章一開首就以陳子龍得悉夏允彝自沉殉國起首：

孟公〔按：即陳子龍〕曰：「古有私諡，我欲諡夏子，可乎？」徵輿曰：「可哉！其所亡國而既亡矣。朝無所冀，野則崇之。且我子習于夏子，吾子而諡，誰曰不宜？」<sup>50</sup>

篇章一開始即討論私諡是否合理，文中宋徵輿提出為夏允彝下私諡合理的原因有二：首先是因為夏允彝死於國變，死時國家已亡，所以只能透過在野的人為他訂下私諡。其次是陳、宋二人都是夏允彝的後輩，受學於他，因此商議私諡一事是合適的。

重新把這兩點解釋放到當時的場景，其實不無問題。首先，時人是否會承認大明已經亡國，這一點實已值得考慮。因為在宋徵輿撰寫這篇文章的同時，南明政權一直活躍於雲南、貴州等地。<sup>51</sup> 如果私諡夏允彝的前提是他所

48 姚蓉，《明末雲間三子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頁 275-276。

49 朱麗霞在整理宋徵輿的年譜時，亦有記錄寫作〈夏瑗公先生私諡說〉一事。詳參朱麗霞，《清代松江府望族與文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354。

50 清·宋徵輿，〈夏瑗公先生私諡說〉，《林屋文稿》，卷 16，頁 433-434。

51 這裏或牽涉士人在南方幾個藩王中選擇新皇帝的爭論，唯這並非本文的焦點，此處從略。有關當時選擇新皇帝以及晚明黨爭的關係，可參考 Lynn Struve, *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5-45. 中譯本可參（美）司徒琳（Lynn Struve）著，李榮慶等譯，《南明史（1644-16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 1 章，頁 1-33。

效的國家已然亡國，反過來說，這正引證了明清的交替已經完結，承認清廷的地位。可以說，與其把這段文字當成宋徵輿向陳子龍作解釋，我們看到的更多是，宋徵輿努力向入主中原的滿清政權解釋私諡所以合理的原由。

本文無意要把宋徵輿讀成變節的小人，反而想指出這種寫作方式保證了文章不會被誤讀成反抗清室的一種做法。而且，再看他提到的第二個原因，表面看來，他是要把私諡從易代等國家問題拉到私人交往之中，把私諡夏允彝的做法拉到傳道授業的情份上。但進一步說，門生能為老師擬定私諡這前設把讀者導向更宏大的傳統，整篇文章於是就有了另一層「保存文化」的意義。

接下來，篇章交代了陳子龍所擬定夏允彝的諡號是「忠惠」，並由宋、陳的對答闡明這個諡號所蘊含的意義。這個私諡能勾起的政治含義明顯不過，那麼，宋徵輿要如何在自己的文章中解釋夏允彝的「忠」呢？且看以下的一段：

從國而亡者，有矣；從城而亡者，有矣。夫豈不義？或拘於時無所復之也，否則，一朝之激也。今夏子處野，土無所寄，敵無所索，民無所望，爰造於淵，如在寢簣。宣厥治命，以訓後人，以申臣誼。史遷有言：「其素所蓄積者。」然也，可不謂忠乎？<sup>52</sup>

這段話把夏允彝的殉國與一般殉國區分起來，說明他在國家破敗、鄉關淪陷以後才自沉而死，目的是要宣示後人為臣之誼。所謂「忠」，本來就與報效家國相關，但這裏卻把夏允彝的殉國解釋為一種為臣者的責任。「忠」的含義因而變成一種抽象的道德價值，並沒有特定的報效對象。換言之，當夏允彝樹立了「忠惠」的典範時，他的例子並不是要激發士人依戀已消失的明朝，反而要提醒仕清的人效忠自己的君主。

宋徵輿並非不知道這篇文章有另一種解讀的可能，所以他特別在篇末加入後記，澄清他的寫作意圖：

或曰：「子仕新朝廷，而亟稱夏子之行，於勝國可乎？」宋子曰：「夫夏子而既死矣，後將以教萬世之臣者。朝而有臣也，將與享其教而胡勿稱焉？」

---

52 清·宋徵輿，〈夏瑗公先生私諡說〉，《林屋文稿》，卷16，頁434。

夫季將軍之重于漢帝，子所知也。」<sup>53</sup>

明清之際，「忠」的概念的變化特別值得注意。本來清兵入關，滿人不能不煽動明朝官員變節投降，但隨著清廷管治漸趨穩定，他們也不能不重建「忠」的論述，以安定仕清的官員。宋徵輿的〈夏瑗公先生私諡說〉看準了這一變化，利用當中的縫隙，對陳子龍與自己商訂夏允彝私諡的紀錄加以解釋，把它變成一份不會被其他讀者誤讀成懷想明室，刻意針對清廷管治的文稿。

不過，這則後記的重要性不限於此。本來文章運用對答體的形式，會讓讀者覺得通篇文章不過是一篇私人討論的紀錄，而且因為對「忠」、「惠」等詞的理解，全部出自陳子龍口中，所以也讓宋徵輿避開了較敏感的政治立場。但後記的出現卻提醒了讀者這篇〈私諡說〉並不僅僅是一場私人討論，而是一篇更嚴肅的歷史紀錄。它有預計讀者的反應，也同時捕捉了明清之際眾文士如何回應夏允彝之死。〈夏瑗公先生私諡說〉提醒我們宋徵輿所面對的時代的特點，他一方面有道德責任把為國殉難的朋友作紀錄，但同時他也必須躲避政治上的各種忌諱。因此，即使他所寫的文章未必完全能看作當時時代的實錄，但從他書寫的策略，我們或許更有可能讀出他所面對的道德與政治環境。

在 1660 年，即完成〈夏瑗公先生私諡說〉的十二年後，宋徵輿再次在撰寫〈雲間五文人祠記〉提到與夏允彝有關的事。當時，宋徵輿正為同鄉的五人——董其昌（1555-1636）、陳繼儒（1558-1639）、夏允彝、陳子龍、李雯設祠，而文章開首即交代了選擇這五個人的原因：「蓋宗伯〔按：即董其昌〕者，我所及見；徵君〔按：即陳繼儒〕者，我所及事。夏子、陳子、季子，此我所兄事而昔者所朝夕者也。」<sup>54</sup>

事實上，夏允彝、陳子龍、李雯與宋徵輿年紀較近，而且同為幾社文士，宋徵輿要把三人合祀，頗為合理。問題是為何要把前一代的董其昌和陳繼儒也納入到「雲間五文人」中呢？

馮玉榮對明清之際松江文人〈同郡五君詠〉所作的研究，特別能解釋這裏的情況。他認為順治年間的松江文人為了逃避易代的矛盾，往往喜歡在題

53 同上註。

54 清·宋徵輿，〈雲間五文人祠記〉，《林屋文稿》，卷 7，頁 331。

詠同鄉的文人時把董其昌、陳繼儒等前一代的文士選入「五君」之中。這樣一來，題詠可衍生的政治含義就很可能被忽略過去。<sup>55</sup> 這種解釋似乎同樣適用於〈雲間五文人祠記〉中。五人的政治背景不盡相同，讀者自然無從由政治解讀全篇。而且，宋徵輿在篇題已利用「文人」二字概括了五人的共通點，這正好也說明他希望迴避任何有關易代的聯想。

不過，回到宋徵輿的文章，他以自己作為連繫五人的線索，讀者自然會聯想到宋徵輿在這裏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說，宋徵輿已經化身成為五文人的記憶的載體，成為明清易代以前的文化的象徵。於是，他為五文人設置祠堂，並不是單純要祭拜同郡的五個文人，而是要祭拜與自己相關的整個地方文化。

文章接著討論了設祠的位置：

或曰：「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今在學宮之側矣。為是五君子也，請有司其逆諸？」曰：「夫學宮之側，名美而實濫，我懼夫五君子之避席也。」曰：「子祠之，詎能必其享歟？」曰：「我非敢祀之於家也。為卜地於國門之外，使夫我郡之人凡思見夫五君子者，與從事於翰墨者，舉得至而致敬矣。」<sup>56</sup>

雲間五文人祠的地點有不少象徵的意義，一方面他無法接受把文人祠設在學宮之側，反而選擇把文人祠安置在國門之外，顯然是拒絕將文人祠置入國家體制之中。但文人祠同時不可能設在宋徵輿家中，因為這種文化的記憶不但屬於他自己，同時也是同郡之人所共同享有的。於是，夏允彝等人在這裏變成地方文化的象徵，他們所展現的道德價值也隨之變成地方文化的一部分。

隨著宋徵輿找到南郊張氏之廢圃作為修建祠堂的地方，文章後半講述的是葺繕祠堂的過程。宋徵輿在廢圃的周圍看到生長的花木：「竹數千竿，松梧數十本，桂與桃各數百本。」<sup>57</sup> 到了祠的左邊，更有百餘株古梅，「其一大者，俯而臨池，枝幹意態屈蹙偃蹇，若有鬼神為之者，二百年物也。」<sup>58</sup>

興廢的描述，不無引導讀者思考文化盛衰之意。宋徵輿在城外開闢出一

55 馮玉榮，〈消解易代：從《同郡五君詠》看清初士人的身份認同〉，《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50.2(2011.3): 83-89。

56 清·宋徵輿，〈雲間五文人祠記〉，《林屋文稿》，卷7，頁331。

57 同上註。

58 同上註，頁332。

個保存地方文化的祠堂，繁多的花木幾乎是興盛的文化的象徵。至於古梅生命的延續，更展示出文化傳承的可能。祠記最精彩的地方莫過於守祠者吹笛的片斷：

守祠王生，年且七十，猶能吹長笛。今年梅作花時，於月下為予吹數弄。時已三鼓，宿鳥忽驚起，迴翔於水上。須臾之間，萬籟間作，戛擊噌吰，若嘯若咳，彷彿如有來遊於斯者。坐客無不肅然心空，亟相與扃戶散去。然後知此地之果可以祠也。<sup>59</sup>

七十歲守祠者的笛聲，似乎透露出文化懷舊的意味。而聲音所引起的飛鳥迴旋、萬籟間作，也就成為文化與自然之間互為照應的象徵。所謂如有來者，指的是雲間五文人受王生的笛聲感召，而遊於祠旁。五文人的出現既證明了宋徵輿所選擇的地點「果可以祠也」，同時也為整個保存地方文化的計劃賦予了意義。

宋徵輿最後以對祠堂不會被拆毀的冀望作結，在這篇文章中，我們不難發現夏允彝殉國的事跡已經隱沒在五文人的描述之中。對於宋徵輿來說，文化價值成為紀念夏允彝的重心，他亦十分清楚自己作為記錄松江文化的人的角色。由此轉入宋徵輿在〈同郡五君詠〉中題詠夏考功彝仲的一首詩，就能看到他和夏完淳、陳子龍的區別：

夏子守風檣，泰華當衝河。抗此五尺軀，寧顧三軍多。月旦垂汝南，<sup>60</sup> 離憂歸汨羅。<sup>61</sup> 回風弭靈駕，吾將陳楚歌。<sup>62</sup>

此詩首二聯概述夏允彝的事跡，彰表他的節義，但文中接著即轉到夏允彝品評人物的描述。我們說宋徵輿所重視的是夏氏的文化價值，尤其可以從這例子中看到。他並沒有只題寫夏氏的「忠」，反而也提醒讀者夏允彝其他值得傳頌的地方。即使下句把夏允彝的殉國與屈原投江自盡相提並論，但詩末一聯我們看到的既不是夏完淳那樣榮獨羞愧的情狀，也不是陳子龍那種悵然若失

59 同上註。

60 句用東漢許劭事。東漢末年，許劭與許靖齊名，二人好於每月月朔品評人物，成為汝南的風俗，世稱之為「月旦評」。

61 句用屈原事。戰國時，楚大夫屈原憂懷國事，投汨羅江而死。

62 清·宋徵輿，〈同郡五君詠〉，《林屋詩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15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 4，頁 497。

的神態。當宋徵輿為夏允彝作楚聲時，我們看到的是整個對夏允彝的悼念已經變成了祭祠的儀式，宋氏表達的更多是對鄉賢的專崇了。

松江文人在宋徵輿撰寫了〈同郡五君詠〉以後，很少再有題詠夏允彝的作品。這一方面固然與時代更迭有關，但是夏允彝在成為松江的文化符號以後，他殉國的事跡似乎也就逐漸消失在歷史之中。直到晚清，柳亞子在研讀晚明的作品時重新發現了夏完淳，夏允彝殉國的事才再次回到眾多研究者的視野之中。

## 五、餘 論

清末民初以來，夏完淳、陳子龍等相繼被塑造為忠義的典範，他們的詩文也因而成為國民教育的教材。至於宋徵輿的作品則因為他的政治立場而備受冷落。可惜，當我們過分強調陳、夏二人的忠義，我們也就漸漸遺忘了他們面對明清易代時所有的掙扎，也忽略了宋徵輿等在入清以後如何透過不同方法去記錄殉國義士。本文以松江文人悼念夏允彝的作品為切入點，正希望揭示夏完淳、陳子龍等在書寫夏允彝之死時所面對的道德難題，以及他們的解決方法。同時希望能表現出宋徵輿等在降清以後，如何透過另一種方式去悼念夏允彝。

世變之中，忠義可以成為文士以殉國來捍衛的價值，但同時卻也可以成為其他文士感喟不已的道德包袱。他們如何悼念殉國的英雄，在不同的身分、不同的社會組合中，我們看到了不同的答案。夏完淳的愧疚不安，陳子龍的耿耿於懷，在在從他們的詩文中反映出來。至了宋徵輿身上，政治與道德的狹縫之間，我們看到了他提供了另一種紀念夏允彝的方式。

本文集中分析與夏允彝之死相關的詩文，目的是要了解明清之際社會與文人心態。這裏從詩文分析提供了一參照點，當然不足以代表整個時代。然而，陳、夏、宋三人的差異，教我們明白士人在以文字處理悼亡的主題時可出現各式各樣的變化。實際上，從悼亡的作品出發，了解中國文人如何運用詩文來憑弔死者，對於歷史與記憶、創傷與超越等議題可帶來很多啟發。如此一來，明清之際文人的悼念之作，似乎仍有更深入探討的必要。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明·夏允彝，《幸存錄》，《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16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 明·夏完淳，《夏完淳集》，上海：中華書局，1959。
- 明·夏完淳著，白堅箋校，《夏完淳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明·陳子龍著，王英志輯校，《陳子龍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 清·朱彝尊著，姚祖恩編，黃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 清·宋徵輿，《林屋文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15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 清·宋徵輿，《林屋詩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15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 清·宋徵璧，《抱真堂詩話》，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清·李延昱，《南吳舊話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清·徐秉義撰，張金莊校點，《明末忠烈紀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 清·曹家駒，《說夢》，《四庫未收書集刊》第 10 輯第 1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二、近人論著

- (美)司徒琳(Lynn Struve)著，李榮慶等譯 1992 《南明史(1644-16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朱麗霞 2006 《清代松江府望族與文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來新夏 2005 《清人筆記隨錄·附〈清人筆記中社會經濟史料輯錄〉》，北京：中華書局。
- 姚 蓉 2004 《明末雲間三子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孫康宜著，李爽學譯 1998 《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孫慧敏 2000 〈書寫忠烈：明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殉節故事的形成與流傳〉，《臺大歷史學報》26(2000.12): 263-307。
- 郭沫若 2005 《歷史人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馮玉榮 2011 〈消解易代：從《同郡五君詠》看清初士人的身份認同〉，《華中師範

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50.2(2011.3): 83-89。

趙園 1999 《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Chang, Kang-i Sun (孫康宜). 1991. *The Late-Ming Poet Ch'en Tzu-lung: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errida, Jacques. 2001. Edited by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as. *The Work of Mourn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urrant, Stephen. 1986. "Self as the Intersection of Traditions: Th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of Ssu-ma Ch'ie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6.1 (1986.1): 33-40.

Gana, Nouri. 2011. *Signifying Loss: Toward a Poetics of Narrative Mourning*.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Struve, Lynn. 1984. *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riting Martyrdom: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Poetry Mourning the Death of Xia Yunyi

Ming Tak Ted Hui\*

###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the literati who had not martyred themselves to the Ming cause felt a growing need to mourn their lost compatriots. This was an awkward predicament if they did not write about the martyrs, the Manchus might completely erase every trace of them from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the fact that these surviving literati had not sacrificed their lives for their state left them open to severe moral criticism by their contemporaries. This being so, how could they possibly appraise their fallen friends when they might feel morally inferior to the dea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icate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adopted in commemorating the death of martyrs to the Ming cause by taking a closer look at how three literati write about the death of Xia Yunyi 夏允彝. After his death, some of Xia's friends died as martyrs, while others chose to surrender to the new regime. We shall begin with a comparison between Xia Yunyi's poetry and the works of his son, Xia Wanchun 夏完淳. By comparing the use of the concepts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in their poetry of mourning,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son's struggle to commemorate his father. This paper then turns to a close reading of Chen Zilong's 陳子龍 works to examine how he attempts to justify his own survival while mourning his lifelong friend. The

---

\* Ming Tak Ted Hui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at Harvard University.

paper end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memorials written by Song Zhengyu 宋徵輿, observing how the mourning of Xia Yunyi is reframed as the preservation of local culture.

**Keywords:** Xia Yunyi 夏允彝, Xia Wanchun 夏完淳, Chen Zilong 陳子龍, Song Zhengyu 宋徵輿, mourning

